

李登輝淡水中學校學習歷程之探究：從 Zimmerman 的自律學習觀點

蔡元隆* 林明煌**

摘 要

本文嘗試從 Zimmerman 自律學習理論的觀點，檢視與分析日治時期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求學歷程的學習方式。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法，針對《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臺灣的主張》、《新臺灣的主張》、《少年李登輝》等作為主要的分析文本，並以其他涉及李登輝相關的著作或研究做為輔助文本來進行分析與探究。經檢視與綜合歸納後有發現：一、李登輝在公學校時期的學習已有初步的自律學習雛型，而有良好閱讀習慣基礎的他，更在淡水中學校時期順利開展其自律學習的應用與實踐，並獲得相關優秀的學業成就表現。二、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課程學習所採用的動機、策略及後設認知等能力，皆確實符合 Zimmerman 所提出的自律學習三個歷程。

關鍵字：自律學習、李登輝、淡水中學校、後設認知、學習心理學

* 第一作者：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Email：tommyorlevis@gmail.com

** 第二作者：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mail：lin5053@mail.ncy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85 年（1996）3 月 23 日，在中國政府連續軍事恫嚇和三位強勁對手的激烈角逐下¹，李登輝（1923-2020）以 581 萬高票（得票率 54%），正式成為臺灣首位正式民選總統（伊藤潔，1996）。屏除政治與政黨的因素，李登輝的當選確實讓臺灣民主向前邁進一大步，因為臺灣的民主改革歷程，雖然政爭不斷，卻能不留一滴血地和平轉移，著實不易。我們都知道李登輝在政治及農業領域上學有專精、出類拔萃，其實他對教育改革也頗有見地與重視。李登輝曾於 83 學年度的空中大學畢業典禮致詞中提及「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動力的源頭」，所以他認為終生學習是一輩子的事。因為終生學習可以增進個體自我的向上學習動機，充分發揮社會全體成員的潛質，改變社會價值觀念，培養國民的思想、道德、審美、政治等素質；我們的國家社會要往前邁進，全體國民就得在自己的生活和行為方面，有向上提升的進取心，虛心愉快的參與各種學習活動，以改變自我的認知和習性（章益新主編，1996）。

由此知悉，李登輝對教育學習十分重視，因為他從小就是一個愛唸書的囡仔，且自日本時代公學校時期起，各科成績就非常優異，進而孕育出他愛讀書的性格。因幼時經常遷徙，這對李登輝個性的形塑有深遠的影響。他曾言：

因為每次搬家都得和好朋友道別，漸漸養成他內向，不喜歡出門的習慣，而在家的時間，他幾乎都是熱衷在閱讀當中。（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頁 18）

除此之外，他的父親李金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影響甚鉅，依據李登輝在淡水公學校時期的同學回憶：

李登輝除了學校的教科書之外，以「少年俱樂部」為首，獵讀許多書籍，連日報的〈臺灣日日新聞〉都讀著，他是一個求知慾望旺盛的沉默寡言的少年。

¹ 此處所提及之三位對手分別為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陳履安（副總統候選人王清峰）、彭明敏（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林洋港（副總統候選人郝柏村）等三組中華民國第九任正、副總統候選人（小笠原欣幸，2021）。

(伊藤潔，1996)(頁 29)

在上述外在因素的影響下，造就了李登輝本身內在的人格特質。在《少年李登輝》一書中曾提到：李登輝不只愛唸書，他還修練到心無旁騖的境界。

阿輝「不怕吵」的天性，使他能利用每節下課期間寶貴的十餘分鐘，做短暫卻十分有效的複習。(邱定一，1995)(頁 126)

由此可知，李登輝不只愛唸書，還能善用記憶策略，將課堂上習得的知識進行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的組織編碼與儲存，而此行為已可初步窺見具備自律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的模式。所以他的同學都說：當下課大家都跑出教室外玩耍時，只有他一個人坐在教室讀書，任外面再怎樣吵鬧，都無法動搖他唸書的心志(引自藍博洲，2000)。吾人進一步的從《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一書中整理出不少李登輝從淡水公學校到淡水中學校時期的口述回憶，從中可以察覺到李登輝從小就很有想法，且相當有自信，並能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透過上述對李登輝求學歷程的粗略檢視，吾人可從教育心理學的觀點來初步推估：李登輝是一個有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學生，更擁有符合學習心理學中自律學習的學習要素，亦即這些教育理論其實都藏在歷史人物的學習歷程與親身體驗中，但我們卻不一定重視。林仁傑(2006)和彭煥勝(2009)曾指出：國內早期教育史的研究取向，幾乎都是偏重在教育人物或事件的「敘事史學」之寫作模式，這大大侷限了教育史研究的多元性。周文欽、周恩文(1988)亦認為：教育史研究與一般史家(特別是以考證為主者)研究的目的有所不同，教育史研究不但要符合歷史研究法的規範，更應在此基礎之上彰顯出教育事實中的意義、特性與價值，因而導致投入臺灣教育史的教育學者更是鳳毛麟角。除此之外，教育史研究若能讓教育理論基礎可以被看見與彰顯的話，這將是開創教育史研究的另一種新趨勢。然而，這種的研究取向在被譏諷為「冷飯熱炒」的教育史研究中，能開創新的研究視野，更可以跨領域結合，碰撞出新火花。爰此，吾人希冀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方法進行跨領域研究，讓教育史結合教育心理學，進而開創臺灣教育史的新研究取向。

本研究將以李登輝淡水中學校的求學歷程為例²，從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觀點，透過相關口述回憶的文本 (text) 進行檢視與分析，探究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求學歷程是否符合學習心理學的自律學習模式？Zimmerman (2000) 針對自律學習的模式，提出了三個檢視觀點：一、具備事前準備能力；二、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三、自我省思的能力。本研究根據上述的三個檢視觀點，針對李登輝淡水中學校求學歷程來進行檢視與分析，探究李登輝求學歷程中的自律學習情形。為達上述的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二個研究子題：

- 一、瞭解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前的求學概述，初步知悉其學習與課外閱讀的狀況為何？
- 二、針對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的課程學習上採用的動機、策略及後設認知等能力，是否符合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三個歷程？如果是，他又是如何的應用與實踐自律學習的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自律學習的理論與意涵

關於「自律學習」研究，國內學者有人將其轉譯為「自學」(self-instruction)、「自主學習」或「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調整學習」或「自我調節學習」、「自我管理學習」(self-management)等 (林明煌，2013；林建平，2005；林堂馨，2018；林清山、程炳林，1995；許家驊，2021)，雖然詞彙不一，但理論基礎、意涵及應用則大同小異。吾人考察上述國內相關文獻後發現：採用「自我調整學習」的解釋較側重社會文化脈絡及師生間在學校文化的場域，而採用「自律學習」則是比較偏重學習者個體本身的意志或想法以及學習歷程上的自主性。因為李登輝淡水中學校的學習模式比較屬於自我的意念與內心想法，且將此想法或意念應用在學習歷程中，故本研究為了文章架構的書寫一致性，文中將均以「自律學習」為主要詞彙進行探討與論

² 研究限制上，本研究僅以淡水中學校時期的李登輝求學歷程為分析對象，主要是考量《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臺灣的主張》、《新臺灣的主張》、《少年李登輝》等主要分析文本中對於李登輝在公學校時期的課程學習資料相較不足，甚難進行深入檢視與分析，故僅採用李登輝於淡水中學校時期的求學歷程，在此合先敘明之。

述，在此先合先敘明之。

「自律學習」一詞，源於 A. Bandura 自我效能的相關論文。Bandura (1977) 認為個體的行為動機主要是由於個人效能期待的認知因素所影響，同時強調個體會主動建構目標、自我評鑑、自我增強、可形塑及持續行為的動機。自律學習是個體為了達到學業目標而採取的一系列控制情緒、思想、行為和環境的活動歷程，歷程中可以藉由設定目標、選擇策略、監督表現及自我評鑑等自律策略來改善學習成就 (Zimmerman, 1989, 2008)。而當中的自律一詞，指的是個體的後設認知、動機及行為下，主動參與他們自己的學習歷程的程度，所以在學習歷程和反應中，學生自己設定有效的目標，透過有效的策略去達成他們的目標，並密切地監控自我的學習成效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2)。所以自律學習是一個達成學習任務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學生能自己設定目標，自由使用適合自己的各種策略去達成目標，並監控他們的活動及評估他們目標的歷程 (Stone, 2000)。換言之，自律學習包含內在的學習動機和學習信念，以及外在的學習策略和學習型態等要素 (林明煌, 2013)。綜上所述，自律的學習者對知識學習具有好奇、興趣和挑戰，而主動與內發則是最關鍵的學習動機的驅力，因為動機是奠基於他們對自身學習能力的自我效能和可預見性外，努力和堅持可以精進個體學習的知識和技巧。

Zimmerman (2000) 認為：當個體宣稱擁有自律學習能力時，其必須有三個歷程能力，而這三個歷程能力彼此互為影響並透過積極主動的個體完成。

第一是具備事前的準備能力，即思考如何計劃、分析及目標設定等策略，並可規劃如何使用與何時使用，而該能力乃涉及後設認知的層面。

第二是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而此階段能力包含了自我控制 (self-control)、自我觀察 (self-observation) 和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三個次歷程，三歷程之間亦相互作用。換句話說，個體針對目標或任務採取實際行動與具體作為，並依照目標或任務的難易度，透過自律學習策略，對自我進行修正，並尋找適合自己的策略來因應目標或任務需求。

第三是自我省思的能力，即個體針對自我學習成果或表現，透過後設認知的能力進行自我評價與改進，以達高效能的學習表現。如 Pintrich (2000) 所言，自律學習者具備四種特性：(一) 主動的建構性；(二) 自我操控的可能性；(三) 目標變動的修正性；(四) 自我的調節性。主動的建構性乃個體會主動建構自己的學習意義、目標及策

略，而自我操控的可能性是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擁有後設認知的能力，可以自我監督與操控。目標變動的修正性則是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會依據目標的標準決定行為是否繼續或改變，而自我的調節性乃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會在個人、情境及自我表現中互相調節。也就是說，所謂的「自律學習」是指學習者在學習的歷程中，會主動的依據個人內發的學習動機，建立學習目標、計劃學習內容、設定學習標準、採用學習策略、堅持學習任務、監控學習進度、並調整自己的整個學習，此學習歷程即稱為自律學習（林建平，2005）。

其實，自律學習與後設認知息息相關（林明煌，2014；張景媛，1992）。因自律學習有助於個體知識的汲取與應用，且個體在自主性習得知識後，藉由學業成就的回饋來調整自己的學習步伐，進而形成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換句話說，學生自己可以設定學習目標，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修正自己在學習歷程中的各項干擾因素，並調整、採用適當的學習策略，藉此來改善並提升自己課業的學習成效（Elen, Clarebout, Léonard, & Lowyck, 2007）。因此，自律學習可視為學習者主動、目標導向的內在行為、動機與認知上對其學業所做的自我控制（王智弘，2014）；它有助於學習者提升自我效能及檢視自我學習情形，透過不斷地監控、修正及調節學習策略的運用，以提升學習成效、達成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張芳全、江淑芳，2020；張芳全、洪筱仙，2019）。

二、自律學習對學業影響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自律學習相關研究（林明煌，2016；林堂馨，2018；許家驊，2021；張芳全、洪筱仙，2019；黃國禎等人，2007；趙珮晴、余民寧，2012；Dignath & Buttner, 2008；Zimmerman, 1989；Zimmerman & Kitsantas, 2005）指出：自律學習的策略是學生用來提升學業成就的手段，而自律學習策略高的學生相對有較好的學業成就表現。因為自律學習策略的心理機制運作歷程包含了認知行為、動機需求及後設認知的交互作用，其最終目的在於使學生在學業成就中獲得改善與進步（Ramdass & Zimmerman, 2011）。

除此之外，學習興趣、家庭背景及性別亦為影響自律學習對學業成就的諸多因素之一。例如：自律學習會因為學習興趣而影響目標與學業成就，且學習興趣涉及價值設定和情感投入（趙珮晴、余民寧，2012；Sorić & Palekčić, 2009）；家庭成員會有意或無意地透過身教或言教，潛移默化的教導學生自律學習的技巧，而學生亦可能在家庭成員的氛圍中得到回饋，進而修正自我的自律學習技巧，尤其是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張芳全、江淑芳，2020；Bynum & Brody, 2005；Ramdass & Zimmerman, 2011）；又，通

常女性比男性對自律學習策略上相較多元性，甚至女性會因為學業上的阻礙而自行尋找協助（張芳全、江淑芳，2020；DiBenedetto & Zimmerman, 2010）。由此可知，自律學習策略使用的高低確實對學業成就上有顯著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主要採文本分析法 (textual analysis)，以《少年李登輝》(邱定一，1995)³、《臺灣的主張》(李登輝，1999)、《新臺灣的主張》(李登輝，2015)、《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張炎憲主編，2008)作為第一手的文本資料。另外輔以李登輝相關的著作或研究做為輔助文本，諸如：《外國人眼中的李登輝》(松本一男，1994)、《揭李登輝底牌》(李曉莊、張覺明，1995)、《李登輝新傳》(伊藤潔，1996)、《李登輝 VS.江澤民》(楊中美，2000)、《共產青年李登輝》等(藍博洲，2000)、《李登輝總統照片集·第一冊家族相簿》(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臺灣政治家李登輝》(柯義耕，2008)、《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李登輝，2013)。

二、文本的分析

文本是人類心智活動時或經由具體化過程後所呈現的表徵，可以是文字、圖像、影像等等，它是觀察社會行動的指標之一，而文本分析是分析上述所列舉的文字等表徵符號之意義(鄭自隆，2015)。文本亦稱為社會製成品，如新聞報導、文學作品或海報圖片，針對這些文本作解析和意義詮釋，即為文本分析之作法(游美惠，2000)。故，文本分析法是運用理論去分析和詮釋文本，分析時必須把文本看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即分析文本的結構，並詮釋如何將理論思想應用到文本裡面；在使用文本分析時要注意社會和文化的脈絡，亦即時空背景和環境會影響語言論述的產生(游美惠，2000)。

文本分析法著重文本所在的社會文化脈絡，亦即留意文本的社會性，其中包含意

³ 此本書雖然不是李登輝的口述訪談回憶，但是邱定一費時五年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了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么弟李炳楠、「國舅」江源麟、堂哥李進龍、淡水公學校同學(紀福明、李清水、李永秋、胡聰明)、隔壁鄰居的小妹高梅玉等，所以對李登輝的描繪與評價有一定的可信度，故將此本書列為主要分析文本之一。

識型態是如何產生、流動，同時也在乎其牽涉到的社會權力關係，所以能夠讓我們更加理解文本背後的社會意涵（林采育，2020）。此外，文本也是不斷進行各種多重多變文化意識型態互動的場域，透過文本內在指涉的情境脈絡用以掌握社會的因素及其與文本的互動，或欲連結社會結構與文本結構（游美惠，2000）。爰此，本研究將採文本分析的方式：首先，釐清 Zimmerman（2000）自律學習理論的學理與觀點。其次，全面的針對日治時期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求學時的相關口述訪談叢書、著作或相關文本進行資料蒐集，並從中連結李登輝的學習狀況與自律學習理論的相關性後，篩選、檢視及挑選可詮釋與分析之文本。再者，透過 Zimmerman（2000）自律學習理論觀點的三個歷程能力，逐步檢視文本中李登輝的學習狀況是否符合自律學習理論。最後，在各類文本的論述中，研究者試圖透過條理的統整與歸納後，希冀瞭解李登輝是如何的應用與實踐自律學習的策略。

肆、結果與討論

一、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前的求學概述

吾人考察並整理相關文獻（伊藤潔，1996；李登輝，2013；李曉莊、張覺明，1995；邱定一，1995；楊中美，2000）得知：大正 12 年（1923）1 月 15 日，李登輝於臺北縣三芝鄉（2010 年 12 月 25 日後改稱新北市三芝區）埔頭街的「源興居」呱呱落地；昭和 4 年（1929）時，李登輝全家居住於淡水，擔任巡查補（類似現今基層警察）的父親李金龍被輪調至汐止時，李登輝已經 6 歲，準備就讀公學校，而其哥哥李登欽已經在小基隆公學校（現今新北市三芝國小）就讀。父親李金龍在與家人協調後，決定讓李登輝與其一同前往汐止，並安排李登輝進入汐止公學校（現今新北市汐止國小）就讀，於是李登輝離開兒時的遊伴與母親，開始了只有父與子的兩個人生活。

根據伊藤潔（1996）、李登輝（2013）、李曉莊、張覺明（1995）、邱定一（1995）、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和張炎憲主編（2008）等文件資料得知以下事實。擔任巡查補的父親李金龍，因為任務的關係，職務經常調動。李登輝在汐止公學校唸了兩年書後，由於父親職務需再輪調關係，他隨著父親又輪調至南港，自然的也被安排進入南港公學校（現今臺北市南港國小）三年級就讀，而此時哥哥李登欽也轉入此校。但好景不常，半年後因家庭因素，哥哥李登欽回到三芝母親身邊，而父親

李金龍也在後半年接到其他任務，隨即又被調回淡水。此時的李登輝並沒有繼續與父親住在一起，他以四年級身份轉入小基隆公學校，而父親因生涯規劃的關係，不久後隨即辭去巡查補的工作，改任職於小基隆信用組合（現今之新北市三芝農會）。當時的李登輝已經受公學校不少臺日籍教師的思想啟蒙，對知識求知的渴望漸漸萌芽，再加上父親李金龍對教育的重視，決定將李登輝轉學到市區更大型的學校就讀—淡水公學校（現今新北市淡水國小）。最後，李登輝終於在昭和10年（1935）3月，於淡水公學校完成了最後兩年的初等教育並順利畢業。公學校的同學們對李登輝的印象總是覺得他是好奇寶寶，在《少年李登輝》一書中提及李登輝對探索外界知識的渴望：

阿輝對於現在文明非常好奇，他認真閱讀報紙，探詢新知，展開圖文並茂的臺灣日日新報，翻閱有關醫學、航空、航海的報導，有時連廣告欄也不遺漏。（邱定一，1995）（頁119）

所以，同學們對李登輝的評價永遠是個愛唸書的囡仔，如前所述其父親擔任巡查補工作的關係必須經常輪調，所以李登輝沒什麼朋友，因此書籍便成了他最好的老師與朋友（何絡編著，1996）。在淡水公學校的同班同學林開壁的印象中，李登輝一天到晚都在看書，且李登輝曾向他述說道：他希望透過閱讀和對歷史的研究獲得更多的知識，藉著研究外在的世界來認識自我（林衡哲，2001；柯義耕，2008）。因為李登輝非常有讀書策略，在淡水公學校的畢業生中成績名列前茅⁴。在《少年李登輝》一書中記載了其在淡水公學校時，他為了升學考試，曾擬了一個讀書作戰計畫：

學海本無涯，既然未來要升上臺北高校或者去師範學校，那麼必須弄清楚將來會考哪些科目。……，首先刪除將來「不必考」的科目，如種菜餵豬課（農業科），體操科、唱歌科。雖然他最喜歡畫畫寫生，但升學考試不考只好犧牲，而不能「忘本」的漢文課，因皇民化的政策推行，也不列入正式考試科目，這是阿輝初步的研究與分法。（邱定一，1995）（頁151）

⁴ 李登輝以平均分數9（滿分為10），第二名成績畢業於淡水公學校，在語文的閱讀、會話、算數、歷史、地理科目上取得滿分（邱定一，1995；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

對於一個公學校臺灣囡仔而言，能清楚了解到自己未來求學的需求，清楚選擇自己未來的出路，有這樣的後設認知能力實屬不易，也間接觀察到李登輝已初步開展出其自律學習的模式。

當時，考試對李登輝來講似乎就是囊中之物，他信心滿滿的報考師範學校與中等學校的升學考試。但在兩所學校接連敗北後，讓一向自信滿滿的他，收起了自信，謙虛的回到淡水公學校的高等科就讀⁵，並積極準備重考來年的公立中等學校。經過一年的苦讀後，他繼續挑戰公立中等學校，但仍慘遭滑鐵盧，最後只能就讀私立的臺北國民中學校（現今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好景不常，李登輝只唸了一個學期，下學期因染上傷寒，使他在醫院休息了一、二個月，最終以休學收場（松本一男，1994；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張炎憲主編，2008）。

昭和 13 年（1938），經淡水公學校日籍校長松田常已向淡水中學校日籍校長坂一世推薦，李登輝以臺北國民中學校二年級肄業生的身分報考淡水中學校（現今新北市立淡江高級中學），並以優異的成績順利錄取（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在淡水中學校的求學期間，他除了課堂的教科書以外，更拓展閱讀領域諸如：《古事記》、《源氏物語》、《平家物語》、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本居宣長的《王勝間》等日本文學，甚至連東方禪學、西方哲學的書籍也都是他的口袋書單之一（李登輝，2015；柯義耕，2008）。

李登輝雖然成績優異，但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卻不曾阻斷他的閱讀意念與求學意志，這樣的際遇與轉折也揭開了李登輝璀璨的人生舞臺。在淡水中學校時，擔任四年級班長的他憑著自律的學習與堅強的毅力⁶，並以黑馬之姿，在昭和 16 年（1941）時跳級考取了臺北高等學校（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⁷。此成就可說是跌破眾人眼鏡，

⁵ 高等科（等同公學校補習科）的學制類似今日的初中學制，是在基礎教育之後又施予較高一級的教育知識，它是規範於臺灣總督府的〈公學校行政規則〉中。高等科是為了讓修讀完六年初等學校（包含小學校、公學校及國民學校）的學生，萬一無法順利考取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實業學校時，繼續修讀的一種兩年制的過渡學制，通常學生程度有一定的水準（蔡元隆、朱啟華，2010；蔡元隆、黃雅芳，2020）。

⁶ 依據昭和 14 年（1939）11 月，由私立淡水中學校及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共同出版的《學則及諸規程 附學事關係法規》中記載當時私立淡水中學校的學制為五年制（私立淡水中學校、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1939）。

⁷ 李登輝當時是考取臺北高等學校的高等科。當時臺北高等學校分有尋常科（約 12-16 歲）及高等科（約 17-19 歲），尋常科每年臺、日人共僅招收 40 人，臺灣人每年能考入尋常科者不曾超過 5-6 人，嚴格來說平均不到 4 人。換言之，如果當年度要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必須是當年全臺灣公學校與小學校兩類總卒業生數的前 6 名，甚至更前面者，才有機會進入臺北高校就讀，

因為淡水中學校創校以來，唯一的一位創下此紀錄的學生。這對李登輝而言，無疑是取得進入當時帝國大學的門票，且對學校而言，更是何等驕傲的殊榮。

李登輝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後，閱讀的功力更是大增，信手拈來的書籍不是 F. W. Nietzsche《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德文書籍，就是 L. Tolstoy《戰爭與和平》的法文書籍，而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或辻哲郎的《風土》等日文書籍，更是他睡覺前必讀的內容（李登輝，2015）。從淡水公學校、淡水中學校到臺北高等學校的求學歷程中，不難觀察出李登輝養成了閱讀的好習慣，時時沉醉在書海之中，這與「書中自有黃金屋」完全契合。

二、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求學歷程中對自律學習的應用與實踐

齊若蘭（2002）指出，閱讀能力愈強的人，愈有能力蒐集、理解及判斷資訊，以增進知識、開發潛能，並運用資訊完成個人目標。擁有此種人格特質的李登輝，在中學時期時曾說：「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而求知若渴的廣泛閱讀，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李登輝，1999）（頁 38）。又如李登輝自己提及：

我認為看書是在判斷自己。差不多十多歲時，我就愛看小說，什麼都看。……，有時間都在看別的書，雜誌、小說等等，尤其有一陣子最愛看戀愛小說。（張炎憲主編，2008）（頁 64）

由此可知，李登輝閱讀的書籍種類確實廣泛，且透過閱讀汲取多元的知識，讓他有更寬廣的思維與眼界。此現象可從他在就讀淡水公學校時，就可看出端倪。他自己在《新臺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到：公學校四年級的某次臺北市見學旅行前，就知道會到市區去，若有機會想去逛書店，因為他非常想要一本《兒童百科辭典》；為了瞭解《兒童百科辭典》的知識，他鼓起勇氣向父親表明想要購買這本昂貴的《兒童百科辭典》

所以說難度極高。這些考上的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菁英中的菁英一點也不為過；而這一群尋常科學生亦獲得日本的最高肯定，當他們考上尋常科的那一刻，就會被認為是最值得栽培的菁英，除非遭退學，否則可一路直升臺北高校高等科、帝國大學，等於是一輩子只需考一次試。高等科每年招收 160 人（其中 40 名開放由尋常科直升），臺灣人每年能考取人數平均在 30 人以下，高等科的學生卒業後原則上「免試直升」日本境內各帝國大學（包含臺北帝大，現今國立臺灣大學前身），除非是比較熱門的學校，如想就讀京都帝大法學部，尚需筆試或面試，否則完全不必再經過考試即可進入大學就讀（徐聖凱，2012；蔡元隆，2019 年 9 月 23 日；蔡元隆、黃雅芳，2020）。

及些許的數學書籍；因為購書費用（約四元日幣）相當於當時擔任巡查補的父親李金龍每個月 10% 的薪水，所以當下父親面有難色；不過出發的隔天，他父親竟然奇蹟般地將這四塊錢交託給他，一圓了他購書夢（李登輝，1999，2015）。從其父親積極的作為，可知其父親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這也間接開啟了李登輝在日後求學過程中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也奠定了他自律學習的基礎。吾人以 Zimmerman（2000）自律學習模式的三個歷程能力，針對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求學時的學習歷程，進行縝密性、系統性的檢視與分析的話，可發現以下的結果：

（一）第一個歷程能力：事前準備能力

昭和 13 年（1938）4 月，由臺北國民中學校插班轉學進入淡水中學校二年級的李登輝，對於繼續升學的企圖心可說是有增無減，除了自我本身的覺醒外，尚受到淡水中學校的日籍校長有坂一世強烈的教育理念—「世界第一」的啟蒙⁸（李曉莊、張覺明，1995）。所以，他很早就萌生繼續升學的意念，據他自己所言：因為將來想要唸帝國大學，所以從二年級到四年級都很認真準備考試（藍博洲，2000）。李登輝曾回憶道：「我進入淡水中學才二年級，就開始真正在拚了。怎麼拚？我都是靠自修」（張炎憲主編，2008）（頁 48）。

Zimmerman（1989）認為自律學習是個體在學習歷程中，在動機、認知與行為上扮演了主動性的角色，以幫助自己達成有效率學習的一種學習歷程。而 Paris（2001）則認為自律學習需仰賴動機和控制，因學習者必需具有激發的學習動力。因為李登輝對自己認真唸書的目標明確，且整個學習歷程都是「主動」的，且知道自己將來要唸帝國大學，他知悉必須透過認真、用功唸書才有機會頭角崢嶸、金榜題名，所以升上二年級後開始認真努力唸書，並且採取了自修的策略進行課程學習。而他的「自修」策略完全符應了 Zimmerman（2000）的學習策略的使用與規劃。李登輝曾詳細地自述了他的自修策略：

中學二年級的書，我在半年以內就自己讀完了；上完二年級，三年級的書已經讀完；三年級時，我自己預習、準備，把四年級、五年級的數學書早些買

⁸ 淡水中學校的日籍校長有坂一世當時上課的第一堂課就明確告知學生，他不主張培養出當醫生、律師、法官的學生，只希望他的學生在做事、求學時，什麼都能「世界第一」，他認為如果你什麼都能「世界第一」，就算你去當乞丐、賣菜，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李曉莊、張覺明，1995）。

回來，提前把習題都做了。(張炎憲主編，2008)(頁48)

從上述回憶的文本中，吾人可以知悉：李登輝想透過自修的方式，先將前一學年的課程內容進行提前學習，且規劃購買並提前閱讀四年級、五年級的數學書籍，並將全部習題複習完畢。根據 Corno & Rohrkemper (1985) 自律學者的定義，李登輝具備了自律學習的內發動機，且能透過各種適當的學習策略達成學習目標。又，李登輝也指出：「因為我自己都「補」在前頭了，進度比同學還要早，如果我去補習，進度反而慢了」(張炎憲主編，2008)(頁48)。這也證明了李登輝具有後設認知的能力，因為他能自我分析，提前複習了前一學年的課程，了解到若選擇參加補習，勢必會延宕自修的規劃行程。此後設認知的行為符合 Zimmerman 與 Risemberg (1992) 的自律學習觀點，即學習者會以後設認知的方式來參與自己的學習歷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並迴避不佳的學習方式。故，這些策略的使用符合了林明煌 (2013) 所提及之自律學習的外在要素 (學習策略和學習型態等)，也驗證了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第一個歷程—具備事前的準備能力。

(二) 第二個歷程能力：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

李登輝雖然在就讀淡水公學校時期的成績十分優異，但自從臺北第二師範學校與臺北第二中學校的升學考試失利後，他開始不再驕傲，漸漸體悟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並透過身體的鍛鍊來砥礪個人心智。例如，在他就讀淡水中學校的住校期間，一般學生對打掃工作都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卻刷廁所、清理廚房，樣樣都來 (柯義耕，2008)。李登輝回憶當時在淡水中學校時自我訓練的情形：

我因為精神上的寄託，知道自我克服的方法了，別人不愛做的事情，我都撿來做，自願向學校要求掃便所，每天早上六點就爬起來，認真去掃便所。我當時就是這樣自我訓練、自我追求，不要自我太強，要放棄驕傲。(張炎憲主編，2008)(頁51)

自修苦讀的李登輝經常早起唸書外，為了訓練自我吃苦的能力，也自告奮勇接下打掃廁所等勞動服務，舉凡能訓練克己功夫的工作，他都願意嘗試 (李登輝，1999；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李登輝透過這些勞動服務來訓練注意力的集

中，而注意力的集中卻是 Zimmerman (2008) 自律學習中所強調的具體作為之一。除此之外，李登輝更靠著運動增強體力，以應付熬夜唸書的精力，在《少年李登輝》一書曾提及：

李登輝在淡中期間更加善用時間，勤練馬拉松、劍術、柔道，身材逐漸向上攀升，夜間則在寢室裡看書，一天當作兩天用，同學們看到她如此拼命都自嘆弗如。(邱定一，1995)(頁 288)

勞務及運動除了能鍛鍊心智外，也能磨練並增強自己的體力。根據科學研究顯示，運動確實能提升學童的認知功能及學業表現(王駿濠等人，2012)。因為學童在面對學習課題與任務時，必須專心的思考與冥想，尋找克服困難的方法或策略，而運動確實能有效訓練學童的專注力。此外，在面對困難時，較高的動機與自主性的學習控制，能幫助個體堅持學習下去，並設定可達成的挑戰性目標；學習者在自我意志力的控制下逃避分心或堅守工作，進而能在情緒控制中克服學習上的困難與焦慮 (Paris, 2001)。

李登輝在就讀淡水中學校時，日日夜夜勤奮地學習。在學生宿舍 10 點關燈就寢後，他便偷偷攜帶學習文具、書本到廁所繼續研讀，或是點起小燈泡躲在被窩裡繼續用功唸書。此行為讓管理住宿生的「舍監」對李登輝發出多次斥責與警告，但也被其頑強的學習精神所感動，因此特意破例開放一所自修教室給他使用 (伊藤潔，1996；松本一男，1994；楊中美，2000)。李登輝回憶當時的情形：

在學寮時，晚上我要讀書到一點，桌子要拿出來外面，沒有電燈可以給細漢困仔讀書，我就在走廊和便所(廁所)旁邊讀書；便所內有電燈，可是不太亮。(張炎憲主編，2008)(頁 50)

從上述回憶的文本中知悉，由於學生宿舍為了管控學生作息，晚上十點一到，就需熄燈就寢，而好學的李登輝為了能繼續讀書，評估當時的狀況，判斷並選擇了各種方式來達到讀書的目的；雖然點燈的被窩、走廊及廁所都不是最佳的唸書場域，但至少能達到自己讀書的目的。他這般的思考邏輯基本上與 Zimmerman (2002) 的論點很相似，即在學習歷程中，李登輝會針對自己設鎖定的目標或任務的難易度，利用各種

學習策略與方式，進行自我學習並修正，藉此尋找一套適合當時情境的學習策略。李登輝進一步指出：

我本來住在學寮（學生宿舍）內，後來因為一部分學寮對電燈等等都管制得很厲害，所以我移去馬偕來臺灣時所設的那所病院住，也就是「馬偕館」。（張炎憲主編，2008）（頁 49）

由於日治後期，戰事漸起，因為常常宵禁的關係，學生宿舍被迫配合國家政策而進行提前熄燈的管制。李登輝為了能在黑夜中繼續唸書，他選擇了搬離學生宿舍，寄住於校外的「馬偕館」。這也說明了李登輝的求學歷程符合了 Zimmerman（2000）的自律學習觀點，即李登輝能進行自我觀察，了解到學習行為與目標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學習歷程中進行自我監控並自我調整學習。又，李登輝曾指出：

到了第四年，我自己準備考試，數學、英文、歷史、地理等等，每項都普遍去讀，把全日本有名的學校的考試題目拿來研究。（張炎憲主編，2008）（頁 48）

也就是說，為了考取臺北高等學校後並直升帝國大學的求學目的，李登輝把數學、英文等科目的考題從頭到尾地研究透徹外，他又敏感地察覺到日文的學習與漢文造詣的重要性，於是他透過學習的自我監控，調整了自己的學習科目。李登輝曾說：

我另外開始讀國文、漢文，當時的國文就是日文，我從《古事記》開始讀；漢文就是讀《論語》、《孟子》、《十八史略》。（張炎憲主編，2008）（頁 48）

總言之，上述的文本分析，驗證了李登輝的自律學習歷程，符合 Zimmerman（2000）所提出的自律學習之第二個歷程—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

（三）第三個歷程能力：自我省思的能力

Pintrich 與 De Groot（1990）曾指出：有效的自律學習的能力，是可以促使學習者

主動吸取資訊，並提升學習成效。綜觀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的成績表現，幾乎所有的成績都是名列三甲，這都要歸功於李登輝對自律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實踐。根據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觀點，自律學習最後一個歷程能力為自我省思的能力，即個體對自我學習成果或表現有覺察後，透過後設認知的能力進行自我評價與改進，以達高效能的學習表現。換言之，學習者在學習後，可以對自己學習表現的評估與反應。李登輝曾回憶：

我的成績平均可能是九十八點（分），漢文、國文可以拿到一百點，數學也很好。老實說，五年級和四年級的學生一起考試，沒人會贏我呢。老師對我的成績嚇一跳，問我：「你怎麼唸書？」我說：「學校考的題目，我都讀完了，你出的題目我都知道。」（張炎憲主編，2008）（頁 49）

由此可知，李登輝對於自己的學業成績能進行後設認知與自我評價。從 Bandura (1997) 的自我效能論來看，李登輝相信自己有能力來組織與執行自己的學習，藉此來達成自己設定的學習目標，故可將李登輝歸類為具有高自我效能的學習者。而在 Panadero、Jonsson 與 Botella (2017) 的研究也指出：自我評估能提升學生自律學習策略的使用和自我效能感，故從上述文本分析中也可得知，李登輝是一位具有自律學習能力的人。

此外，在 2005 年出版的《李登輝總統照片集第一冊家族相簿》一書中，淡江中學校提供李登輝就讀淡水中學校時的成績單顯示：他在學校三年的平均分數是 89.6 分，尤以幾何和代數的成績最為優異；四年級的代數分數為 100 分，而幾何 97 分（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2005）。從此成績單觀之，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的歷年成績，雖然與李登輝自我描述的成績上有些許的出入，但這並不與李登輝是否具備自我省思的能力有相衝突。因為 Schunk (1996) 指出：自我效能不一定必然跟一個人的實際成就表現有所關聯。所以綜合上述，李登輝對自我學習的歷程與成果表現確實符合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第三個歷程—自我省思的能力。

伍、結論

如何培養學生成為一個「主動的學習者」(active learner)或「自律學習者」已經成為近年來我國教育改革發展中最重要核心之一。事實上，學習者如何主動地調節、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在近年來一直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與重視。吾人若能拋開了視學習為被動吸收知識的傳統觀點，逐漸將教學的核心聚焦在學習者學習過程中主動調節的歷程上，則強調自律學習便是未來我國教育的趨勢(謝志偉，2003)。但我們知道自律學習這個概念在 A. Bandura 所提出的自我效能論後，它其早已藏身在臺灣教育史中學生學習經驗的歷程中。所以，吾人嘗試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方法來進行跨領域研究，讓我國教育史研究可以結合教育心理學的觀點，藉以開創臺灣教育史的新研究取向。同時，讓臺灣教育史中的教育理論基礎可以被看見與彰顯，甚至可以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對話，讓臺灣教育史研究在深度與廣度向上提升。

爰此，本研究以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的求學歷程為例，試圖以 Zimmerman (2000) 對自律學習的三個歷程能力為檢視基準—具備事前準備能力、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自我省思的能力，對李登輝相關的口述回憶的文本進行檢視與分析。經檢視與歸納後，本研究有兩個發現：

- 一、透過瞭解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前的求學概述，初步瞭解李登輝的閱讀習慣從公學校時期就已經逐步養成，而透過年齡的成長、智識的開展和理解能力的增長，不同時期的李登輝透過閱讀不同種類的書籍來開拓他的眼界與思維，更透過其他語言的學習，閱讀不同國家的經典著作建立寬闊的國際觀。這顯示李登輝在公學校時期已有初步的自律學習雛型，具有良好閱讀習慣基礎的他，更在淡水中學校時期順利開展其自律學習的應用與實踐，並獲得相關優秀的學業成就表現。
- 二、李登輝在淡水中學校的課程學習上採用的動機、策略及後設認知等能力，確實符合 Zimmerman (2000) 自律學習的三個歷程—具備事前準備能力、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自我省思的能力。首先，在具備事前準備能力上，李登輝採用「自修」的策略，並透過後設認知，明確評估不適合與同儕一起補習的原因及可能產生的後果。再者，在意志與表現的操控能力上，透過勞動與運動來訓練注意力的集中，並針對學習目標或任務的難易度採取適合自己的實際行動與具體作為。因此，點燈的被窩、走廊及廁所都是他唸書的克難場域。甚至，在後期時怕夜間閱讀受干擾，直接遷移外宿「馬

借館」，以確保持續閱讀的場域。最後，李登輝針對自己學習成果或表現，可以進行確實的自我評價與改進表現。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智弘 (2014)。自我調節學習。T&D 飛訊，183，1-17。
- 王駿濠、張哲千、梁衍明、邱文聲、洪蘭、曾志朗、阮啟弘 (2012)。運動對孩童認知功能及學業表現的影響：文獻回顧與展望。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7 (2)，65-94。
- 何絡編著 (1996)。李登輝全紀錄 1923-1996—李登輝先生與臺灣的政治發展軌跡。臺北：生活智庫。
- 李登輝 (1999)。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
- 李登輝 (2013)。為主作見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臺北：遠流。
- 李登輝 (2015)。新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
- 李曉莊、張覺明 (1995)。揭李登輝底牌。臺北：書華。
- 周文欽、周恩文 (1988)。歷史研究。載於賈馥茗、楊深坑 (編)，教育研究法的探討與應用 (頁 1-34)。臺北市：師大書苑。
- 松本一男 (1994)。外國人眼中的李登輝。臺北：國際村。
- 林仁傑 (2006)。論歷史研究的典範轉移及對教育史研究的啟示。教育研究集刊，52(3)，73-101。
- 林明煌 (2013)。日本語教育の自律的学習研究に関する考察。世新日本語文研究，5，85-112。
- 林明煌 (2014)。意識化活動を通じた非日本語学科生の自律的学習能力の習得、喪失と再生。台灣日本語文學報，36，253-378。
- 林建平 (2005)。自律學習的理論與研究趨勢。國教新知，52 (2)，9-25。
- 林堂馨 (2018)。以自主學習為主的大學能力本位課程設計及實施。課程與教學季刊，

21 (2) , 59-84。

林清山、程炳林 (1995)。整學習因素與學習表現之關係暨自我調整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效果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28，15-58。

林采育 (2020)。台灣偶像劇的大齡單身女性形象再現：2009-2019年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高雄。

林衡哲 (2001)。二十世紀臺灣代表性人物 (上)。臺北：望春風。

邱定一 (1995)。少年李登輝。臺北：商周。

徐聖凱 (2012)。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 (2005)。李登輝總統照片集·第一冊家族相簿。臺北：允晨、國史館。

張炎憲主編 (2008)。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臺北：允晨、國史館。

張芳全、江淑芳 (2020)。馬公國中九年級生背景因素與自律學習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學校行政雙月刊**，126，86-117。

張芳全、洪筱仙 (2019)。澎湖縣國中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研究。**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教育類)**，50 (2)，1-32。

張景媛 (1992)。自我調整、動機信念、選題策略與作業表現關係的研究暨自我調整訓練課程效果之評估，**教育心理學報**，25，145-161。

章益新主編 (1996)。細讀李登輝。臺北：中央日報。

許家驊 (2021)。國小低年級學生多元解題自我調節量表之編製發展與實測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2 (4)，829-856。

彭煥勝 (2009)。近 60 年來臺灣教育史學發展的回顧與省思。**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 (1)，1-21。

游美惠 (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8，5-42。

黃國禎、朱蕙君、陳佐霖、王姿婷、曾秋蓉、黃國豪 (2007)。線上自律學習輔助系統之研究與實證。**科學教育學刊**，15 (3)，317-334。

楊中美 (2000)。李登輝 VS. 江澤民。臺北：時報文化。

趙珮晴、余民寧 (2012)。自律學習策略與自我效能、學習興趣、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8 (3)，1-32。

- 齊若蘭 (2002)。閱讀·新一代知識革命。天下雜誌，263，40-50。
- 蔡元隆 (2019年9月23日)。天之驕子：讀《菁英、文藝與戰爭：由舊制臺北高等學校傳閱雜誌《雲葉》。GPI 政府出版品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2022年2月5日。
取自 <https://gpi.culture.tw/news/10031>
- 蔡元隆、朱啟華 (2010)。臺灣日治時期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嘉大教育研究學刊，25，95-117。
- 蔡元隆、黃雅芳 (2020)。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臺北，秀威。
- 鄭自隆 (2015)。傳播研究與效果評估。臺北：五南。
- 謝志偉 (2003)。自我調節學習理論之探究。課程與教學季刊，6 (3)，147-168。
- 藍博洲 (2000)。共產青年李登輝。臺北：紅岩。

外文部分

-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Yoward an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1-215.
-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 Bynum, M. S., & Brody, G. H. (2005). Coping behaviors, parenting, and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problems in rural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tudies*, 54,58-71.
- Corno, L., & Rohrkemper, M. (1985).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learn in classrooms. *Research on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2, 53-90.
- DiBenedetto, M. K., & Zimmerman, B. J.(2010). Differences in self-regulatory processes among students studying science: A microanalytic investig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 2-24.
- Dignath, C., & Buttner, G. (2008). Components of foster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on intervention studies 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 *Metacognition Learning*, 3, 231-264.
- Elen, J., Clarebout, G., Léonard, R., Lowyck, J. (2007). Student-centred and teacher-centred

- learning environments: What students think.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2, 105-117.
- Panadero, E., Jonsson, A., & Botella, J. (2017). Effects of self-assessment 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self-efficacy: Four meta-analyses.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2, 74-98.
- Paris, S. G. (2001). Classroom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6(2), 89-101.
- Pintrich, P. R. (2000). The role of goal orientation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M. Boekaerts, P. R. Pintrich, & M. Zeidner (Eds.),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pp. 451-502).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Pintrich, P. R. & DeGroot, E. V. (1990). Motivational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omponents of classroom acade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2(1), 33-40.
- Ramdass, D., & Zimmerman, B. J. (2011). Developing self-regulation skil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homework. *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s*, 22(2), 194-218.
- Schunk, D. H. (1996).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New Jersey: Pentice-Hall.
- Sorić, I., & Palekčić, M. (2009). The role of students' interests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interest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4(4), 545-565.
- Stone, N. J. (2000).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ibration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4), 437-475.
- Zimmerman, B. J. (1989). A social cognitive view of self-regulated academic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1, 329-339
- Zimmerman, B. J. (2000). Attaining self-regulation: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M. Boekaerts, P. R. Pintrich, & M. Zeidner (Eds.),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pp.13- 39). New York: Academic.
- Zimmerman, B. J. (2002). Becoming a Self-Regulated Learner: An Overview. *Theory Into Practice*, 41(2), 64-70.

Zimmerman, B. J. (2008). Investigating self-regulation and motiva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5, 166-183.

Zimmerman, B. J., & Risemberg, R. (1992).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gifted students. *Roeper Review*, 15(2), 98-101.

Zimmerman, B.J., & Kitsantas, A. (2005). Homework practi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belief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0, 397-417.

小笠原欣幸 (2021)。臺灣總統選舉 (李彥樺譯)。臺北：大家。(原著出版於 2019)。

伊藤潔 (1996)。李登輝新傳 (白水譯)。臺北：希望。(原著出版於 1996)。

私立淡水中學校、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 (1939)。學則及諸規程·附學事關係法規。臺北：大明社。

林明煌 (2016)。非日本語学科生の自律的学習能力の育成効果—意識化活動をとおして—。東アジア教育研究，1，1-16。

柯義耕 (2008)。臺灣政治家李登輝 (蕭寶森譯)。臺北：前衛。(原著出版於 2007)。

The Investigation of Mr. Lee Teng-Hui's Learning Process in Tamsui Middle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immerma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del

Yuan-Lung Tsai* Ming-Huang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Mr. Lee Teng-Hui's learning method and process in Tamsui Middle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immerma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del.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extual analysis. The texts, articles and books, "A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Lee Teng-Hui (I)- Early life," "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 "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 (New)," "The Young Lee Teng-Hui," and other secondary research articles about Lee Teng-Hui, are under closed analyzed and examined.

There are two research findings. Firstly, when Mr. Lee Teng-Hui studied in Middle School, he not only had already had a basic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totype, but also had a good reading habit. This helped him a lot to develop and deliver hi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actice. Therefore, he attained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Secondly,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strategy and metacognition that Mr. Lee Teng-Hui applied during learning was indeed corresponded with Zimmerma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del.

**Key words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e Teng-Hui, Tamsui Middle School,
Metacognition, Psychology of learning**

李登輝淡水中學校學習歷程之探究：從 Zimmerman 的自律學習觀點

* Frist Co-Author: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tommyorlevis@gmail.com

** Second Co-Auth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